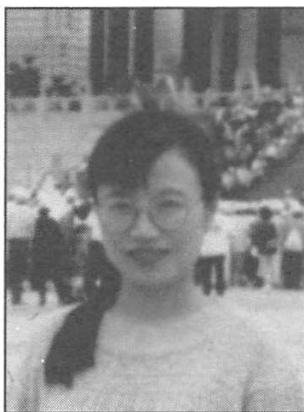


天主教家庭中女性的信仰理解

范麗珠 侯杰 合著



七十年代末以來，天主教信仰活動在中國各地城鄉逐步恢復。對於普通信徒來說，用簡單的「恢復」來概括他們的信仰活動是否恰當？在民間社會，普通信徒究竟是如何實踐宗教生活呢？這些問題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關注。衆所周知，近年來整個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影響人們思想觀念和宗教信仰的因素也不斷日趨多元及複雜，至於女性的天主教信仰更是如此。本文就是通過在天津市寶坻縣一個天主教村的實地調查，希望藉對天主教家庭中女性的信仰理解的研究，來展現在民間社會層

面天主教信仰所充當的角色。

為什麼要研究女性天主教教徒

爲了做中國北方農村天主教會的研究，我們來到了天津市郊寶坻縣的護路村。經過訪談並結合一些文獻記錄，獲知天主教會在護路村有上百年的傳教歷史，信徒比較多。據《寶坻縣志》記載：該村有二百二十戶人家，九百一十七人，其中教徒約佔百分之八十。是次研究的出發點是要關注鄉村天主教信徒的宗教生活，及其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發展變化。我們認爲，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私人生活與鄉間公共生活中的一部分。因爲對有些人來說，宗教主要是涉及家庭和當地會衆的私人事務。不論對教會的事務熱心與否，都是個人的私事，別人無權指手劃腳。當然，那些有關村莊中鄰里之間的各式各樣非正式的流言散布於各處，在鄉下卻不是稀奇的事。

我們對天主教女性信徒產生研究興趣，完全

是因爲我們常常在村中的教堂或教徒的家中進行訪問，聆聽這些訪談對象講述發生在村裡的事情，而講述者多數是女性。因此，從總體上來說，和信徒家庭中女性接觸的機會或談論的時間比較多。於是，如何認識和理解社會轉型時期鄉村天主教女性信徒的信仰，以及女性在家庭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問題，漸漸地在我們的研究視野中突顯出來。

理論和方法

在傳統社會，兩性天平基本上是向著男性的一方傾斜的。正如 Ursula King 在《宗教和性別》(Religion and Gender)一書的導言中所說：「婦女沉默的時間太久了，如今，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人們，包括農村婦女，對『男女平等』這樣的口號早已不陌生，但實際上女性的聲音往往會被一些表面上及形式上的東西掩蓋。她們的心願和意志也不能夠充分地表達出來。坦白說，從女性的角度研究中國農村婦女，特別是這項研究所關注的中國農村女性與

天主教的課題，尚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學術界也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和研究。

不可否認，由於婦女研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婦女運動的產物之一，所以不少學者比較關注婦女的從屬地位、女性身份以及社會性別角色等方面的问题。在理論方面，受到階級分析和對下層社會異化觀念的影響，女性研究中出現了以婦女受壓迫的物質與經濟形式為研究對象；同時，另有一些學者主張把婦女視為歷史的推動者，而不僅僅是一種消極的社會形象。他們試圖以新的觀念來重新描繪婦女的社會形象，評價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角色和作用。（榮頌安·1986）一九七二年，美國的人類學家 M. Wolf 在《台灣鄉村的婦女和家庭》(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中提出要以婦女作為研究中國家庭中心的觀點，扭轉過去偏重男子佔主導地位的家庭制或族長制的偏向。由於社會史研究不斷地開展，並且深入進行，受其影響，婦女研究也逐漸吸收了新社會史在理論和方法上所強調的

從社會底層研究開始等主張，突出普通人的行動和意識在社會歷史上的實際作用，運用不同學科的概念加以分析說明。故而，七十年代的婦女研究不再是著眼於某些著名人物，而且開始將研究對象轉向處於社會底層的普通無名女性。

在寶坻縣護路村，我們所接觸的女性信徒雖然各自家庭的經濟狀況並不相同，但是可以明顯地看出她們中絕大多數已經不再是繼續保持傳統家庭中的那種「小媳婦」形象。經濟上的獨立，使她們這些常年生活在鄉村中的普通婦女不僅可以當家做主，行使自己的權力，而且常常會使在中國傳統社會被賦予很多特權的丈夫們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妥協讓步，她們在鄉村生活中的空間顯出自在的傾向。這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普通農村家庭中的婦女，和天主教有著各種各樣並不相同的關係。她們當中有一些人是自幼出身於天主教家庭，繼承了家庭的信仰而成爲教友；有些人則是因爲婚姻的關係由非教徒家庭出嫁到天主教家庭，這種現象是文化大革

命時期開始普遍起來的。(當時因為環境所迫，有些人不敢公開表明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從而使教徒與非教徒之間的通婚甚少遇到宗教信仰方面的阻礙。)對於她們本人來說，宗教信仰與日常生活一樣開始得十分平靜而自然，鮮有濃重的政治色彩，但也不乏在其生活圈子內引起轟動的例子，連同一些看上去純屬雞毛蒜皮之類的家庭和鄰里糾紛，實際上都在不同層面上反映各自所具有的文化意義，反映了她們對天主教倫理觀念的不同理解、天主教與非天主教信徒之間因禮儀不同所引起的文化衝突、新的社會環境對宗教誠律所產生的衝擊，以及所引起的各種不同的反應。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主要採取了深入訪談的方式。這是因為我們在進行中國北方農村女性與天主教研究課題的過程中，很難得到當地相應的文獻資料的支持，而利用訪談的方式獲得大量寶貴的研究資料越來越獲得海內外學術界的認可。近年來，學術界的一個發展趨勢就是在傳統的文獻材料蒐集

與分析之外，利用實地調查的方式，發掘、蒐集檔案、口述記錄等。此種方法不僅為人類學、社會學等廣泛採用，也得到歷史學家的重視。採用實地調查和採訪的方式，使口述材料和實際生活體驗的記錄成為文獻資料之外的重要資料，得到了海內外學者的普遍認同。年鑒學派的 Feuvre 指出：「沒有書面史料，也可以而且應通過其他方面來再現歷史，……人所有的、為人服務的、標誌人存在、活動和生活方式的東西，都可以利用。」(馬 271-287)參與觀察式(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實地考察和深入訪談是蒐集非文字資料、展現民衆生活的重要途徑。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貝拉(Bellah)及其合作者趙文詞(Madsen)等，在寫作 *Good Society* 和 *The Habits of Heart* 等著作時主要使用的就是通過訪談而獲得的資料，其學術成就也是令人矚目的。

此外，我們的研究之所以選擇位於華北農村的天津市寶坻縣的護路村，一是因為該村有上百年

教；二是有鑑於長期以來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多是在華南，較少選在華北。Judd 在 *Gender and Power in Rural North China* 一書中也曾提到這個問題。事實

上，對北方農村展開人類學研究，實際上是有著其不可忽視的意義，我們寄望能夠於通過此一實地研究，為中國女性與天主教信仰，乃至漢學研究提供一個北方的典型。

護路村屬於天津郊寶坻縣，十多年來，寶坻縣依靠位於京津兩大城市的地理優勢，以鄉鎮企業的建設帶動農村經濟發展。護路村雖然不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但在這裡也能體會到北方農村開始富裕起來的景象。我們走訪過的多數家庭，幾乎都有新建的寬敞房院，目前仍住在舊房子的人家，也多醞釀興建新房的計劃。農業種植仍是各家的主業，不過他們都在積極尋找新的出路。天主教信仰的恢復是在七十年代的末期，最初沒有教堂，是在教徒家庭內聚會或搭建臨時的棚子舉行儀式，新的教堂是在一九九二年建成起用的。建教堂的一部份費用

是由村裡的信教家庭奉獻，在出多少錢這件事上男人們多是讓女人來處理。

天主教信仰是這個村子內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當然無論是每日清晨誦唸玫瑰經、到教堂祈禱，以及對教會事務的參與，似乎並不需要經過深沉的宗教思考，質樸單純並不表明她們的信仰生活無意義。下面我們就從幾個發生在護路村典型事件，來思考蘊涵其中的文化意義。

喪葬儀式與文化概念的衝突

李亦園教授曾經在《喪葬儀式與文化概念的衝突》一文中記述了河南省偃師縣的一場由辦喪事所引起的家庭風波。這場風波發生在一九四一年偃師縣東平村(擬名)。一位受洗基督教家庭的老祖母過世，彌留之際老祖母吩咐其子，葬禮一定要按照基督教儀式舉行。其子媳到老祖母的娘家去報喪，告之喪禮將按照基督教儀式舉行。老祖母的娘家是村中的大戶，並沒有皈依基督教，不但反對喪禮將

按照基督教儀式舉行，還提出要依照和遵從中國傳統入葬的習俗。外甥也不聽娘舅的意見，雙方的爭執遂之而起，釀出大打出手的不歡場面，最後也沒能解決雙方的意見分歧。結果，喪家的子女用十字架和西樂將老母送至墓地，而娘舅家則在靈柩走過家門時擺上供品，焚燒金銀衣紙，舉行路祭告別親人。

我們在護路村也聽到了與李亦園上述事故十分相近的事件。衝突的焦點也是源自天主教和當地傳統信仰（被村子人統稱為「大教」）的人們在禮儀方面所存在的某些差異。

金平是一個典型的十分能幹的農村婦女，她人長得高大，既潑辣又能操持家務，近些年來，在農餘還和丈夫一起幹了一個頗具規模的養雞場，以供養分別在北京和長沙上大學的兒子；金平同時也秀外慧中，家裡院中到處都收拾得井井有條，給人一種十分舒服安樂的感覺。她受到了丈夫的尊重，在她朗朗地講述事情的時候，丈夫始終都在笑謎謎。

地望著。金平講述了她自己的一件曾經在村中引起過轟動的事情，也是和葬禮有關。

金平出生於「大教」家庭，六十年代中期結婚，其婆家是個有天主教信仰傳統的家庭。對此，金平並非不知。鑑於一些涉及到禮儀等方面的事會造成無謂的麻煩，當地原本有著大教人不和天主教家庭通婚的風俗。但是當時正處於政治運動之中，有些天主教徒在不同的場合表示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媒人到金平家提親時特意講得十分清楚明白，對方家庭已經不信教了，於是這樁親事做成。婚後的生活沒有什麼太多的波瀾，一家人相安無事，生活得也很和美。丈夫雖然說是自幼領洗，但是在平日從來都不提及天主教信仰方面的事；婆婆每天在自己的屋裡偷偷唸經，甚至私下給金平的孩子們施洗。金平儘管知道婆婆實際上始終都是一個很虔誠的教徒，但是與家庭生活並無大礙，所以她都裝作沒看見。

八十年代初，她的婆婆病在床榻，家中來了

很多村裡的教友，專門爲彌留之際的婆婆唸經祈禱、唱聖歌。金平自然也很關心婆婆的情況，在照顧來人飲食之餘，還不時走進房中探望並侍候自己的婆婆。但是，她很快就發現屋子裡的教友對自己並不怎麼歡迎，以爲她是大教的人，不該在病人身邊出現。最令金平惱火的是婆婆的表妹一見她進去就不斷向她灑聖水，金平知道聖水是驅趕惡魔用的，不應該用在自己身上。她照顧婆婆是盡自己爲兒媳的孝道，因爲她和婆婆才是同一屋檐下的親人。矛盾漸漸激化，信教的一班婆娘們似乎在責怪金平沒有信奉天主教，金平和婆婆的表妹便不可避免地爭吵起來，她說：「如果不是當初破『四舊』，大家都不信教了，我才不會嫁過來呢！你們就死了這條心吧，你們這樣對我，我才不會信教呢！」

不久，金平的婆婆逝世了。毫無疑問，葬禮是按照天主教的禮儀進行，而金平則被排除在外。因爲失去親人而心情悲痛的金平決定在自己的房間內按照大教的禮儀爲死者擺供。事先她還特意諮詢

了村裡對「禮」懂得比較多的老人，老人告訴她這樣做可以，因爲「隔教不隔禮」。按照當地大教的風俗，要擺桌、擺四碟菜、四碗飯。金平請來四位大教的親戚（一定要是全和人）來壓桌。待送殯的從墳上回來時，在院子門口點著一把秫秸邁火，一人一塊糖（意爲先苦後甜），吃一塊事現蒸好的糕（意爲日子越來越高）。不過，這一切都是金平自己一個人享用了。

本來華北農村，大凡村子裡辦紅白事，都會招來人們湊熱鬧，金平這樣的舉動更成爲一時的新聞。所幸的是金平婆家的兄弟沒有因爲她的行爲而釀成風波，鬧出糾紛，但是她與天主教禮節對著幹的言行卻遭到了村裡人們的議論。

發生在護路村的這件不快事，隨著時間的消逝成爲村中人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我們對這則由喪事所引發的事情，關注的當然不在於判斷是非對錯，而是理解爲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另外，金平作爲人家媳婦，還能堅持自己認同的某些不能

爲天主教信徒接受的儀節，若不按照一般的家庭糾紛來理解的話，其背後有甚麼文化意義呢？

根據傳統功能學說的解釋，宗教葬儀在人的生命旅程中的重要是因爲它具有對社會的調和功能。然而，我們在這裡所關心的是：金平所在的天主教家庭的葬禮，不但沒有達到哀悼死者之情，加強戚誼的功能，反而造成了從未有過的衝突。李亦

園用半個世紀前河南省偃師縣葬禮的事例，對功能的解釋提出質疑，提出不幸喪儀是社會的結構與文化化的概念不能調和的表現，認爲衝突應該理解爲基督教作爲異質的(heterogeneous)文化與中國農村固有的純一的(homogeneous)社會不協調有關。他進而將喪儀的衝突歸納爲解釋現代中國社會受西洋文化影響後引起變遷的模式。

透過金平將大教的儀式帶入天主教信仰家庭所引發的衝突來看，的確表現了在天主教信仰的農村，不同信仰的群體在某些特定禮儀方面存在著難以調和的差異。故而，近些年來很多天主教家庭對

於聯姻很小心地遵循「不娶大教媳婦」的原則，以儘量避免無謂的衝突與難堪。顯然，由於天主教在護路村已經有著一百多年的歷史，村民之間對於應該如何處理發生在兩個不同信仰群體的矛盾已經有了簡單而可行的辦法，達成某些共識。所謂的「隔教不隔禮」實際上就是要努力尋求一種在異中求同、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方式。

作爲出自大教家庭的兒媳金平，與天主教婆家的矛盾，與其說是表現在某些不同的觀念上，不如說是具體化行動方式方面的差別。因爲即使是天主教徒，他們的價值觀念也未必與大教的鄉親有什麼巨大而不可調和的分歧。和其他較早就流傳到中國的外來宗教一樣的，(或者說有命運相似的地方，就是天主教的民間化。異質文化相遇，觀念的衝突是不可避免，這是兩個文化系統互相碰撞而未能協調發展所造成的後果。村民接受天主教信仰，並不能證明他們全面而系統地接受了天主教完整的文化體系，徹底脫離了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在中國華

北農村，鄉間固有的傳統具有一種能力，使得「桔生淮北則爲枳」。在我們的訪談中，一位老婆婆在流利地背誦了「天主十誡」後說：「信天主和信佛沒有什麼區別，都是讓人做好事。」

儘管如此，在護路村畢竟存在著信仰並不完全相同的群體，其間的差異最明顯的就表現在儀節上，這正是金平事件的關鍵。也就是說在表達同樣的情感和需要時，屬於不同信仰群體的人使用了迥異的符號系統來支撐儀式。具體表現在葬禮儀式上的就是：信大教的人要擺供、磕頭、燒香、焚冥幣等，而信仰天主教的人則是祈禱、唸經、豎十字架。這些不同的符號因爲有宗教文化作爲背景，遂具有著絕對的合法性，故而在村民中就具有了不可改變性。對於村民來說，儀式的重要超過了其他。在訪談中，不少老年人都抱怨神父改用本地語言來主持儀式，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感。如果能夠由他們自己選擇的話，這些老年人寧願按那根本就不知所以然的拉丁語來聽宗教宣講。

金平因婆婆的葬禮一事弄得沸沸揚揚而無端受到一班信奉天主教的老年婦女的指責，很不以爲然，其丈夫也不置可否。她敢用「本來嫁他家之前就講好了，我才同意的」之類的話爲自己表白，這一切其實也表明護路村天主教家庭中女子的地位。

同時，對於娘家，金平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因此，她還有爲自己父母盡孝的義務。金平說，有一次從天津來的李神父問她爲什麼在天主教的家庭生活了這麼多年還沒有改信教，金平很認真地回答：「我的父母還在，如果我眞的信天主教，也要等他們百年之後，我爲他們燒完七道半紙才行。」

在婆婆去世後的這些年中，每逢清明和婆婆的忌日，金平都會托人捐錢給教堂的神父，請神父爲婆婆作「安息彌撒」，可是她自己卻從來不進教堂。也許這是出於共同對故去者的孝心，而表達方式以及使用的符號則大可不必一定要自己認可的。

天主教觀念與日常生活

對於天主教徒，村裡人有他們自己的眼光和判斷。在他們眼裡信徒內部有「冷淡教友」和「信得真教友」之分，每逢提起某人「信得真」時，都外是講該信徒天天唸經、進教堂等等。天主教家庭中的女性們對自己的觀點也毫不忌諱公開講出來，使我們得以了解她們與天主教的關係。

天主教信仰與道德

不論「冷淡教友」或「信得真教友」在談論天主教時都普遍認為，天主教是叫人學好，不做壞事。有不少老婆婆還能清清楚楚地背誦出「天主十誡」，以此體味到天主教對人們日常生活中言論行為的道德關懷。

我們訪問過的馬玲，四十多歲，她的父母是村裡公認的「信得真教友」，她卻自認為是「冷淡教友」。「當然我不是大教了，我生在天主教家庭

嘛！」她說自己在成長的階段恰好是文化大革命，沒有接受過天主教的教育、不會唸經、不知道怎樣祈禱，進到教堂怕被人家譏笑。其實，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覺得村裡的教友並沒有起到好榜樣，所以她甚至說：「如果他們能做出榜樣來，我也進教堂唸經。」實際上，在天主教女性的心目中也常常是用一般做人的標準作日常的道德尺度，約束人們的言行，如不偷、不搶、不幹壞事、孝敬老人。在鄉村，現在還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有足夠的權威，使人由敬畏，由畏而收斂一些過於自私的行為。天主教家庭中的女性對日常的道德人格有著一致的認同，但是她們有些作為卻難以令人滿意。

生與死

生死的問題涉及到人的終極關懷。我們接觸過的老婆婆們對身後是否能上天堂特別關心。馬玲的母親說：「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再不信天主、多唸經，死了以後還得不下地獄？」她覺得只要按照

「天主十誡」去做，不能直接上天堂，在煉獄裡受的苦也不會太多，經過煉獄後也還是能上天堂的。她很擔心時下的年輕人，不唸經，不孝敬父母，也不管死後要到地獄去受苦。馬玲的一個朋友開玩笑的說：「人家不是說，竟看活人受罪，哪看見死人享福呢！」馬玲的母親對此頗不以爲然地說：「等你老了以後就知道了。」因爲懼怕死後的事而篤信天主教，似乎不免帶有世俗的味道，但這確實是鄉間天主教信仰十分重要的一個原因。

生育觀念

和許多其他地方的情形相似，護路村的婦女也是傾向於「多子多福」。雖然中國政府有很嚴格的政策限制人口增長，但是在我們走訪的家庭中，超計劃生育的現象十分普遍，二十多歲的女人有二、三個孩子並不稀奇，四十多歲的李秀珍是六個孩子的母親。因爲前五個孩子都是女孩，李秀珍堅持生第六個，幸好是兒子，才完成了其生育工程。

當問及計劃生育政策是否違犯天主教的信仰時，她們幾乎都認爲不是。也就是說，保守的天主教派所反對的控制生育、反對墮胎的觀點並沒有得到中國鄉村天主教女性的回應。至少在我們訪問過的女性信徒中，她們對計劃生育在理論上不反對，因爲這是國家的政策；之所以會在實際行動上違規，則需要從農業生產、需要男性勞動力以及重視男嗣的傳統觀念等來考慮。

天主教信仰與外面的世界

對於護路村的天主教徒來說，天主教在一百多年前是一個全新的信仰體系來到中國，而到眼下經過了時間歲月的洗禮，如大教人在儀式上要擺供、磕頭一樣，它早已已經成爲這方土地上文化歷史傳統的一部分。無疑，外面的世界是一個日益世俗化的世界。不過，在我們所接觸到的爲人母者，對於自己的子女有機會離開鄉村，普遍都感到無比的自豪。金平的兩個兒子大學畢業後，分別在北京及

天津工作；馬玲的兒子在天津讀大學；李秀珍的兒子在天津做生意。讀書、做生意、參軍等成爲護路村人走向外面世界的重要途徑。母親們在考慮孩子前途的時候，把天主教的信仰擺在非首要的位置。至於信仰是否會流失，那是孩子們自己的事。

是否在現代化的社會中生活一定要拋棄宗教信仰呢？這是一個不斷受到挑戰的觀念。斯塔科和本布里奇(Stark & Bainbridge)在《宗教的未來》(*The Future of Religion*)一書中認爲世俗化不是現代社會的專利，因此有關世俗化趨向於無宗教未來的解說是錯誤的。不過，在護路村我們看到鄉村教會在應付洶湧而來的經濟潮流時，還是沒有什麼新的方式來適應變化的社會。

對天主教的反叛與回歸

玉霞曾是天主教信仰的反叛者。她的母親是一個相當虔誠的教徒，但是她自己的行爲卻受到護路村教徒們的批評，成爲人家眼中壞女人的典型。儘

管她已經離開村子多年，人們還是會議論到她的一些是非非。最初，她在家人的極力反對下和一個從天津來的知識青年(非天主教徒)結婚，然後又違犯教規離婚。在天主教徒看來，離婚是很不道德的一種罪。玉霞現在一個人帶著年幼的女兒在天津的一個農貿市場經營從老家販來的各種農產品，日子過得有些艱難。然而，現在的她卻十分虔誠地信奉天主教。而從天主教信仰的反叛者到虔誠地信奉天主教的這個轉變是在天津完成的。主要是因爲在她離婚後的最初的日子裡，是教會的教友幫助她走出了困境，使她真心地感到主在關心著她。

玉霞在困難中依然保持樂觀。但她的困惑是來自現實生活和信仰之間的矛盾。「市場和國家的全球性的流動製造了難解的道德困境」。(Madsen:1989)作爲一個沒有城市戶口的女子，在

天津這樣的工商城市生活，要安守本分並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來養活自己和心愛的女兒，其難是可想而知的。雖然她知道離婚已經是違犯了天主教的誠

命，但她覺得「我沒有成爲任何人的情人，就是一功，沒有犯大罪，如果今後能保證不再婚的話，功能還更大。」

對她來說，最大的困惑是自己目前的職業與信仰之間所發生的衝突。這也常常使她感到痛苦。

她很坦率地說：「信教不能做買賣，良心好也不能做買賣，真正規規矩矩的人是做不成買賣的。」在她看來，不騙人幾乎就賺不了錢。她所謂的騙人就是在賣東西時不給足夠的分量。所以她覺得自己每天都在犯罪。「每天都在犯罪，也無法想以後能否進天堂的事。只能考慮現實，活著是第一重要的。」

她個人未來的生活問題，目前還是個未知數，不過選擇對象的標準是不要農民、不要太窮的人，僅僅是個好人是不夠的，一定要有錢或有本事能賺錢。

玉霞的經歷反映著現代生活中教徒所面對的一些問題，在以往傳統的基礎上告別傳統，即要接受新生活的挑戰，同時還受到傳統道德的限制。玉霞在世俗的功利主義與宗教的道德倫理中掙扎，生

存的物質需要與宗教的精神安慰均爲她所渴望的，是否可以並行不悖地存在呢？怎樣才能在現實生活中，使中國的天主教信徒能夠既關注來世同時也能關注現世？一個追求自立的天主教信徒能否被固有的宗教倫理所寬容與接受呢？

現有的一些宗教社會學理論圍繞著世俗化與宗教的命運曾有過很多的探討，但其中有關中國的宗教經驗卻十分缺乏。玉霞的經歷似乎說明：現代社會在改善人們物質生活以提高人類對物質佔有欲的同時，卻無法真正地「放逐」宗教，因爲人在不同的階段對生活意義的追求會有不同的表現。貝爾(Bell)在面對現代化的問題時，曾提出向宗教求援，解決道德淪喪、貪婪成性的社會問題。「由於宗教接觸到人的意識泉源的最深處，人意識到一種人生局限的文化，在某個時刻，便會重新回到對神聖意義的挖掘上。」(Bell.. 1989)但是，目前中國社會的情況與西方的不同；中國人所面臨的不是「後現代」帶來的危機而是在尋求現代過程中的問題。我

們看到玉霞對物質的追求是冒著衝犯天主教道德倫理的危險的。為了生存，她還是並不情願地「每天在犯罪」；但對傳統道德的認同仍沒有喪失，因為她還需要從中得到精神方面的慰藉。

結語

對天主教家庭中女性的信仰理解，實際上涉及到的問題遠遠超出了女性的話題本身。我們看到圍繞天主教家庭中所出現的文化和儀式的衝突是有其歷史的背景和複雜的社會原因，並不僅僅是家庭內部的糾紛。天主教女性信徒對宗教的態度和觀念，與整個社會的變遷有著密切的聯繫，也就是說任何地方，即便是鄉村也無法成爲世外桃源，或多或少都要感受到甚至捲進社會的變遷之中；觀念與行爲衝突的事情也無可避免地發生在尋找和創造新生活的天主教女性信徒身上。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當舊有的倫理觀念受到挑戰，無論是傳統的宗教信仰或是政治性的意識形態，都很難完全爲公

共領域提供集體的原則時，個體的主觀選擇性空前增加，同時在主觀選擇的過程中便有了更多的困惑。

對天主教家庭中女性信徒的研究，使我們更關注日常生活本身。應該說通過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和對女性內心的了解，能夠發現許多枯燥的概念所無法觸及的東西，特別是當你悉心聆聽每個人敘述各自不同的故事時，便會發現這不僅是個人故事，更有一個共同的歷史背景在襯托，而比一般的「大」歷史更加真實具體。一些隱藏在生活背後的意義，也由此展現出來。 □

（作者按：本研究得到了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n Scholarship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Gender 的資助，特此感謝。）

（編者按：本文附錄參考文獻書單甚長，限於篇幅，無法在此刊出。讀者若對該書單有興趣，可直接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范麗珠小姐聯絡。）